

军地两家长

汪晓佳

热气腾腾的饭菜犒劳人民子弟兵,但他们都是一律婉言谢绝,秋毫无犯。一个“双抢”季节下来,一个个支援官兵“双抢”的官兵,都被太阳晒得脸上和胳膊上紫红红的一片,甚至过后脱了一层皮,灼痛难忍,也毫无怨言。

我们是机械化部队,汽车多。我当兵的那年,便有幸成为了一名汽车驾驶员。在汽车技术训练几近半年的时间里,汽车教练队的十几辆苏式“嘎斯51”六轮牵引车,一年到头,队里的领导,总是主动与地方上联系,不是帮助乡村生产队运送农作物,就是帮助城里合作社运送百货,而且在运送的过程中,繁重的装卸劳动,也都是解放军自己承担,只给群众送方便,不给百姓带麻烦。

那年,因为蚌埠肉联厂生猪供应紧缺,一时处于半停产状态,驻蚌埠部队知道后,组织了二十多辆“嘎斯51”汽车,到临泉县紧急调运货源。我也参加了抢运生猪的义务劳动,整整一个多星期,在

蚌埠至临泉绿荫遮盖的省级公路上,满载肥硕生猪的汽车,从早到晚,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每天每辆车往返两次,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下午这一趟回来的时候,往往都是凌晨时分了,驾驶员困顿难忍,有的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了,满载生猪的汽车便弯曲着前行(好险啊),有经验的驾驶员老兵,每当在行驶中发困的时候,就会把车子停在路边,稍稍休息一会儿,等等“瞌睡虫”走了再继续开车。

肉联厂过意不去,每次运猪回到厂里,食堂里都安排了可口喷香的饭菜等待我们随时食用,他们原意是免费供应的,但是,我们都是先买饭菜票才去吃饭,否则,宁愿饿着肚子,或者自己在街上随便吃点什么,也不去吃免费餐。

也就是这次突击抢运生猪的某一天晚上,我驾驶的汽车从临泉回来途经利辛境内时,一个女孩突然横穿公路,被我的车子不小心碰倒在地,后面的车子也

紧跟着停了下来,我们连忙把孩子抬进我的驾驶室内,急忙开往附近的利辛县城医院,经过检查,所幸这孩子的伤情没有妨碍,第二天早晨就笑盈盈地跟着她家大人出院了。我们几个战友临时凑钱,凑了一百多元,执意要送给孩子的家长,让买些好吃的东西给孩子压压惊,可是他们说什么也不愿意收下,还安慰我说,“甭说孩子没怎么碰着,就是碰上了也不能怪你,你也不是故意的。”这番暖人心的话,至今我都难以忘怀。

我和这孩子以及她的家长,素昧平生,非亲非故,之所以他们说出了如此暖人心的话语,并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针对整个人民解放军的肺腑之言,真真切切地体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和军地友谊。

如今,我离开部队已经四十多年了,可这些生动感人的幕幕场景,回忆起来仍觉得那么无比温馨……



杨大全

吴燃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享誉画坛的国内著名版画家,在七十年代初,流寓安徽的那些年,我身为一名爱好美术的插队知青,因给刊物投稿,而有幸被著名儿童画家陈永镇先生所发现提携。1972年春,我被陈先生所在的安徽出版局从乡下借用去省会合肥,为刊物画插图。此间,也有幸认识了当时正在安徽省博物馆画画的吴燃先生。那一次,我壮着胆子不揣冒昧地从破旧的画夹里,掏出一叠带着乡下泥土味的农村生活速写来,向他求教,不想吴先生在一番很有兴致的阅看后,很高兴,并连声夸奖,给了我许多的勉励和宝贵指教,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裨益。

那时,我正当年轻且踌躇满志,更是求知若渴。初见到吴先生时的印象至今未忘:他外表平朴,不究穿着,开朗随和、言谈风趣而幽默,俨然一副大家风范谦然于身。

他那些深深打动和吸引我的许多田原诗歌般的版画作品,亦如他极富于人格魅力的言谈所留给我的美好印象,从此都镌拓在我的心际。未曾想到的是,后来在我结束六年农村插队的知青生活,重又回城上了安师大艺术系学习美术时,竟再次与吴燃先生不期相遇。当时,恰逢他受到艺术系邀请,借调来给我们一年级新生上课。

记得那段时间里,只要有空闲,我时常会约上三两学友,或自己单个人去艺术系教学楼附近坡上的教工大院,那间吴先生临时居住的宿舍,来拜访先生。吴先生对我们这班年轻学子们的频繁造访,也从来都是不厌其扰,热情接待。哪怕他正看着书,抑或手中正做着什么,也会很快放下,并热心专致地陪我们说话……每每,他那些充满艺术大家所具有的睿智启迪,和有着诗意般艺术视野的生活故事和趣谈,都无不深深地打动和吸引着我们;其中围绕着当如何学会对生活的观察和艺术创作的思考,几乎成为吴燃先生与我们谈话的主题。每一次即使都是同样的话题,但内容和谈话的趣点都不一样,加以生动幽默的个性化语言表达(甚至配合音乐、动作),声情并茂地演绎显示给在座的我们这班学子去感受并领会、记取。去揣摩生活中各类不同阶层人士的属性、身份、年龄职业的形象差异与区别,在画面情境安排中出现时的

神态、表情动作之细微差异。现在想来,先生当年给我们开的这些课堂学习之外的小灶,是何等珍贵的画外大学问啊!这也是惟有如吴燃先生这样的艺术大家,和真正的导师,方可将自身从生活与创作中所获得的这些真知灼见与非凡见地,传授给这些求知若渴期待指引点拨的我们,不啻是为我们推开了眼前的一扇封闭已久的窗户那样,使那时的我们顿然眼前一亮,艺术视野也豁然开朗起来。

随着我和吴先生更多的接触和受其濡染,越发地加深对他的敬崇和师生情谊。有一次,我贸然地邀请他去我在芜湖的父家作客,吴先生也愉快地接受了我代表全家人的邀请,因我之前也向他谈起过我父亲的过往经历及对我学习艺术的影响……

那天,吴先生见到我父亲后,两下若老友故知,一接上话茬,都是北地乡音——倚腔倚调,如乡党熟知相谈甚欢。席间谈及许多北地家山过往艺术轶事和相关人物……我竟一时被他俩撇在一边,辅以小酒与佐餐碟菜为之助兴。那天,他们聊到雕塑家刘开渠、音乐家马可等,和从家山当年走出来的许多艺术家的昔日轱闻旧事……

是的,皖北萧县、砀山素与我老家江苏徐州同为近邻,虽为陇海线上的跨省地域,但语音与生活习俗都极尽相似。历史上两地且素有南宿(州)北徐(州)之亲切称谓。

我曾有幸于上世纪70年代当知青时,在合肥与先生幸遇,后来又在安师大上学时得之他的诸多教诲濡染,几近成为他的爱徒。

那几年,他客羁安徽师大任教,于我是得益匪浅。当年,我也想潜下心来向先生学习版画,后因他很快要回返天津文联工作,我也只得悻然作罢了。

至今难忘的还有吴燃先生带我们去皖南的贵池马牙山区,去户外写生月余的那段时间里,我与他朝夕相处,看他对景写生(用骆驼牌铁皮旧烟盒制成的小写生来)给我们边画边演示如何掌握取景、构图等基本要略,尤其讲画面纵深感(远、中、近景的关系及表现方法)以道路延伸感举例,至今仍记忆犹深……

另外,他诙谐风趣的言谈中,无不都时时在启发我们如何观察思考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人物与环境的联系,以及人物个性之表现与特点。这些都与在艺术创作相关的重要经验和要领。纵使如此,他也从不干巴巴地向我们刻意地说教,而总是以一番风趣有味的谈吐甚至是轻松笑谈中让我们愉快领会和感受学习之趣。

吴燃先生是个很有浪漫情怀和热爱生活、热爱乡土的诗情画家、艺术导师。他知识渊邃,博识多才。深谙少数民族地方音乐的神韵,和以此所引发的浪漫画面的联想。在他一生的作品中所流露表现出的唯美、乐观向上的情操更是他艺术生命的长青藤和绕指柔。这些,都对我的艺术观形成也影响极大至深。

如今,斯人远去了,忆起这过往与吴燃先生相处日子里的往事之点滴,勾起我对他更加深切的敬仰与长久不去的感恩怀念心意。愿吴燃先生一路走好!在天堂里快乐永远!

(2020年6月13日夜写于成都寓中)



长江淮河流域发生超历史汛情,一个个险情告急!人民解放军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党员干部一线值守奋力排除。一个组织就是驻守大堤上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一面旗帜就是激励着抗战士军民顽强拼搏的斗志。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谱写一曲曲动人的军民团结守初心战洪魔的图腾。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第一时间人民解放军和民兵预备役部队从四面八方汇聚防汛前线,成为抖音、微信和新媒体刷屏的亮点。群众喊道:“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放心了”。安徽东至县民兵教练员陈寿春被洪水浸泡到浮肿起皱的大脚成了网红——抗洪,不“足”为惧,乌云密布下的大堤上排成长龙阵的那抹丛林绿被救生衣点扮得格外耀眼,狂风暴雨中搜救人民群众的一只只舟艇犹如浩瀚星空中的启明星,无论是几条杠的老兵还是稚嫩脸颊的新

标杆、树好榜样。安徽肥西三河镇、六安丰乐镇和阜南王家坝开闸蒙洼行洪区的老百姓的转移安置,一名村妇联主任从发现山体滑坡迹象到成功转移全村百姓用了不足10分钟时间,无不彰显基层党组织的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生动场景随处可见,奏响了军民团结、共抗洪灾的时代强音。官兵涉水推舟转移群众、扛沙包、堵管涌、封决口……一幅幅图片视觉冲击着读者。一名小学生用积攒的零花钱购买慰问品送到抗洪官兵那里,江西潘阳湖一位历经多次重大防汛任务有着丰富经验的年近八旬老人主动放弃转移加入抗洪队伍,安徽某地防汛大堤上来了一群大妈大婶为官兵装填沙包,防汛官兵转移撤离500米群众6分钟鞭炮送行……一个个感人举动激励官兵。

洪水无情人有情!抗洪抢险这场人民战争中,彰显了军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精神,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在灾情里得到淬火,镇村党委支部危险面前挺身而出、在困难面前勇于担当,为党员群众作出示范、立了

难忘的军旅生涯

任贻升

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每到这个时节,十二年部队生活画面犹如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闪现,让我不由地想起自己的军旅生涯。

1986年10月下旬,我怀着对部队生活的美好向往和憧憬,踏上了前往军营的列车,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时光如梭,弹指一挥间,1998年底,我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结束了十二年的军旅生涯。

军营,不仅让我体会到了紧张有序的快节奏,真正领悟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涵义。同时也磨练了我的意志、培育了我坚韧不屈的性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记得在新兵将要下连的前两天,我的心情特别好。因一个月的新兵生活,我饱受“思乡念家之苦,度日如年之累”的煎熬生活就要落下帷幕,再加上新兵排长告诉我,我被推荐到特务连或汽车连。这两个单位是每位新兵特别向往的地方,也是我们新兵下连谈论最多的话题。特务连带有一种神秘感,进汽车连则代表自己即将掌握一门技术,对来自农村的我来说,更是梦寐以求。但结果事与愿违,我竟被分到在天津农场担负着种水稻任务的高炮连。听说去农场种水稻,在农村长大的我,失望极了,没想到自己白天想、夜里梦的军营生活,竟要在种水稻中度过。但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别无选择。我只有重树目标,暗下决心:“好好干,争取早立功受奖,给老家乡看看”。

1987年的新年刚过,我们连队就开始了紧张的田间劳作,先是

修整水渠,接着整理苗床、筛、撒粪渣等春播前准备。每天都是朝出暮归,吃在田头。对连里分配的每项工作,我都是尽心尽力地完成,脏活累活争着干、抢着干,处处总想着争第一,早立功。那时,我的战友们也都在暗地里较着劲地干,总怕自己落在后边。干活时,个个像小老虎,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记得育秧时,要把每袋一百七八十斤的稻种,沿着二三十公分宽的田埂,送到离大路近五百米的育秧田里,任务的艰苦可想而知,担负此项工作的,都是个大、身体比较扎实的,按个头和身体,我都不是最佳人选。但一向不甘落后的我,主动请战。几天的背扛,原先六个人的运输队伍,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心甘地当了“逃兵”,只有我和湖南籍的大个子文书记坚持到任务结束。

对于种水稻的感受,我认为最苦、最累、最难忘的,应该是稻田的管理。当时,我们全连三十几名战士,却担负着二千多亩稻田的管理任务,再加上天津地区野芦苇、稗子草特多,前一遍管理还没结束,后边芦苇和杂草又生起,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每天头顶星星而作,脚踩月光而归。从脚踏入稻田起,一弓腰就是一天,真是蹲得腿疼、弓得腰疼,伸得脖颈疼,使我们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另外,我们每天还要承受着上晒下蒸、蚂蝗叮、水蛇干扰的煎熬。每天收工时,一身泥巴、一身水,个个都成了弓背“老头”,但每次我们还是列着队、唱着雄壮的军歌,士气高昂地回到营房。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稻收季节,我们连队的稻田亩产均达到了千斤以上。当看着用自己辛苦和血汗换来的一袋袋、一车车稻谷被装上专列,战友们禁不住落下了眼泪,这滴滴泪水包涵了无限的辛酸和喜悦!最后,我们在连长的带领下,不约而同地放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年底,由于工作出色,连队被授予集体三等功,我也受到了连队的嘉奖,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除了在连队播种水稻的生活,让我难忘以外,1988年那段靶场生活,同样令我难以忘怀,至今仍历历在目。

记得那年新春刚过,我们连队就撤离天津农场进驻黄骅高炮靶场,由生产转入军事训练,为参加当年北京军区高炮大比武做准备。黄骅靶场坐落在远离黄骅县(现黄骅市,原靶场已成为渤海湾一个综合港口)一百余里的渤海湾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既没树木,更没花草,抬头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沙滩和大海,连队所有的生活物品都要到黄骅县城或沧州市区采购,极为不便。靶场生活环境也十分恶劣,蚊蝇本身就多,再加上整个靶场就我们一个连队提前进驻,可想而知,蚊蝇简直成灾。每天刚蒸好的一笼笼白馒头、大米饭,只要一掀锅盖,上面就扑满了黑压压的一层蝇子。一开始天气凉爽,还没感到蚊蝇的害处,进入到七八月份,蚊蝇带来的害处开始显现,全连近一半的官兵先后患上了痢疾,开始拉稀跑肚,好几个患上了红白痢疾,我也未能幸免的成

为其中一员。可能是由于我一直在外地驻训,水土不服的原因,进入八月下旬,我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由跑肚拉稀转变为恶性红白痢疾,每天跑厕所十多次,最多一天二十多次,简直是提不上裤子。但作为连队唯一的高炮测手,为了不影响连队的整体训练和射击任务,我只好带病坚持。由于连队医疗条件的限制,我每天只能靠口服庆大和大蒜治疗,靠自身的抵抗力与疾病抗衡。同时,我同全连官兵每天还要顶烈日、战酷暑,一身水、一身汗地坚持训练。就这样,我带病在靶场硬扛了一个多月,体重下降了二十多斤,可以说是提着裤子完成的合成训练与射击任务。最终让我欣慰的是,我们的付出有了回报,在北京军区高炮实弹射击大比武中,连队完成击落拖靶目标,成为二十集团军唯一击落拖靶的连队,连队荣获集体二等功,我被授予旅嘉奖。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经历1992年、1998年的大裁军后,我告别了军营,复员回到地方。但每当我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军营生活,仍然让我难以释怀,对自己人生中曾经有过一段军人的经历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段军旅生活,也成为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它时刻鞭策着我,提醒着我,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无论走到哪里,干什么工作,都不应该改变军人的作风和本色。也只有这样,才无愧于一名军人的称号。



吴燃画作



吴燃书法作品